

考古四记

田野中的历史人生

郑嘉励 著



四川人民出版社

田野中的历史人生

考古四记

郑嘉励/著

 四川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 数据

考古四记：田野中的历史人生 / 郑嘉励著. — 成都 : 四川人民出版社, 2018.1

ISBN 978-7-220-10438-1

I . ①考… II . ①郑… III . ①考古工作－中国－文集
IV . ①K870.4—53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7)第256744号

KAOGU SIJI: TIANYE ZHONGDE LISHI RENSHENG

考古四记：田野中的历史人生

郑嘉励/著

责任编辑	吴焕姣 杨雨霏
责任校对	袁晓红 申婷婷
责任印制	王俊
出版发行	四川人民出版社(成都槐树街2号)
网 址	http://www.sepph.com
E-mail	sermehbs@sina.com
新浪微博	@四川人民出版社
微信公众号	四川人民出版社
发行部业务电话	(028) 86259624 86259453
防盗版举报电话	(028) 86259624
印 刷	鸿博昊天科技有限公司
成品尺寸	155mm×230mm
印 张	18.75
字 数	250千
版 次	2018年1月第1版
印 次	2018年1月第1次
书 号	ISBN 978-7-220-10438-1
定 价	48.00元

■ 版权所有·侵权必究

本书若出现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我社发行部联系调换
电话:(028) 86259453

序

缪 哲

据《大品》(Mahavagga)，摩揭陀国王频毗娑罗欲优礼佛陀，遂遣人为寻觅一佳处，供他与从者隐修；按国王的想法，它离城不要太远，也不要太近，可便于来往，俾众人皆得瞻礼；白天人不要太多，晚上没有噪动；无尘扰，寡轮鞅。……同样的话，也见于《小品》(Cullavagga)……这就不难理解何以今所知的重要的僧伽蓝(Sangharamas)，莫不见于某大城之附近；何以城越大、越富，赖之而兴的寺院便越雄伟。这样在塔克西拉——旁遮普邦一度的边城，我们便有达磨拉吉卡(Dharmarajika)大塔与寺院；……在中印度繁庶的维迪萨城郊近，则又有桑奇的僧伽蓝。后者的壮丽的遗址——寺、塔、柱，便是本书的主题。

这是约翰·马歇尔(John Marshall)著名的考古报告《桑奇遗址》(1924)的开篇。它所散发的情致与温暖，是罕见于今天的考古报告的。在约之同时的、然较之为业余的考古报告中，又有更个人化的笔触。如斯坦因的三部新疆报告中(《古代和田》《西域考古记》与《亚洲腹地》)，其作为考古—探险者的身影，便始终隐现着：他的勇武，他的焦虑，他的盘算，他初见希腊化风格遗物时的思乡之情。同样的笔

触，也见于勒考克等人的新疆报告；乃至信笔所及，竟至佣工的争吵，与他对争吵的道德评判。盖由于当时技术、交通的落后，考古同于探险（西方称之为 *expedition*）；探险的艰辛、新奇与激动，便与考古发掘一道，扰动人的智力与感情，至临纸为文，不能自己，遂一并录入文中了。但随着物力日进和考古的专业化，当初的探险者，已变为今天的“考古工程师”；考古者的个人身影，则渐为专业中的不体面因素，是必欲去之而后已的。

但略知考古的人，都知道考古工作的内容，是与其他历史分支绝然有别的。如我从事的艺术史行当，人称是 *armchair scholarship*（书斋里的学问）。所以称“书斋”者，是这工作多在脑子里进行，无甚社会行为，也不大有书斋外的经验。考古则不同。挖人的庄稼，要给人补偿；刨人乡贤的坟墓，则须有感情的安慰；挖掘亦非土行孙行地，可一人承担；工作又非一日可就，挈妇携雏，不光专业不许，也苦了妻儿。这样考古者的工作，便介于村调解、包工头、野行者与人文学者之间；其所牵涉的人际协调、社会组织及二者所带来的书斋外的经验与感受，是其他学者不易想及的。这些内容，或惊险有未逮，论趣味及可借窥考古学的发展，则无殊斯坦因等人书中的“闲笔”。唯因见斥于专业要求的客观，这些社会与人性的侧面，便消泯于考古报告，幸赖一二考古学者的私人档案始得窥之。其中最著名的之一，乃是意大利米兰大学所藏的埃及考古档案，内含 19 世纪以来埃及学家在考古现场所作的大量书信、照片、日记与笔记；在记录考古信息的同时，也记录了当地风光、民情，与当地人的协商及交往，和对家庭、友人的思念等（Patrizia Piacentini, 2010, 2015）。除所包含的趣味与人性因素外，作为考古社会史的内容，这些资料固已成为西方学术史的重要话题（Margarita Diaz-Andreu, 2007）。

嘉励兄《考古四记》一书的内容，即多属于被现代考古报告所排斥

的“闲笔”。它以随笔为体裁，记录了过去20余年间作者在浙江省内考古的部分经历、见闻及普通读者或乐于闻知的工作心得，故读过书稿后，便不禁想起早期考古报告中的个人性笔触，和米兰所见埃及考古档案中的日记、书信之内容。唯嘉励兄的专业领域是宋元考古，稍及明清。由于此时期文献记载的发达，考古的意义，便远不及早期的为重要；兼以宋代之后，江南不复为政治中心，社会亦趋扁平，故嘉励所做的发掘或调查，便多是村野小墓，实未尝有惊动天地的发现如罗塞塔石碑或良渚的城址。因此，这书吸引人的地方，原不在题材之显赫，而在叙事之得宜、文字的有致与文间所弥漫的人情世味。孟子说，“矢人惟恐不伤人，函人惟恐伤人”。人之所业，多影响性格；现代考古工作的工程化特点，往往泯灭人对世味的感受。嘉励兄为辅助发掘，颇留意发掘地方的掌故，对方志与乡邦文献，又尤所用心。而这些，乃近于现代考古兴起前的古物学家（antiquarian）的志业。故由文字之内容，推考其学术性格，嘉励兄的趣味，似介于现代考古学家与古代古物学家之间，宜其文字有致、必为普通读者所乐读了。对学术界的兴趣而言，他所记录的信息，虽不尽关乎重要发掘，但考古工作的日常机制，与普通考古者的日常工作之内容，今人或视以为常，将来则未尝不是隐秘的知识，须仰赖一二有心人的记录方可取得——如米兰埃及学档案所见者。到了那一天，嘉励兄的这册小书，我料必是其中的一种。

目 录

寻墓记

- 寻墓记 /003
附录 吕祖谦的肖像 /037
盗墓笔记 /041
杜范墓 /045
史嵩之墓 /051
妾之命运 /057
黄岩南宋赵伯沄墓发掘记 /063
雷峰塔地宫考古发掘记 /075

行路记

- 越窑、沙僧及其他 /095
樊岭 /101
龟山 /107
子城 /115
基业 /121
古邑永嘉 /127
渤海纪事 /133
嘉兴读书记 /147

品物记

- 南宋：一个王朝的背影 /155
访碑札记 /165
竹口 /177
古物丛谈 /193
龙公庙 /207
长安道上 /211
玉环文旦 /227

怀人记

- 这些人，那些事 /239
最后的美德 /257
去者 /261
代后记 考古者说 /279

鸣 谢 /289

寻墓记

寻墓记

自2006年起，我在浙江从事宋元明墓葬的调查与发掘，曾经主持过武义南宋徐谓礼墓、黄岩南宋赵伯沄墓、武义明招山吕祖谦家族墓地等重要墓葬的工作。2017年2月，我在“一席”所作题为“寻墓记”的演讲，是我多年来对浙江南宋墓葬的框架性思考。唯囿于时间所限，话题未能充分展开。

从接到“一席”邀请那天起，对公众讲什么内容，颇费思量。后来，我决定放弃考古生活八卦、工作花絮、重大发现的叙述模式，选择了几乎“纯学术”面向的话题。这是冒险的决定，但值得尝试。演讲中诸如“我是一名考古工作者，上班就是上坟”之类的段子，虽为活跃现场气氛临时加入，貌似自我调侃，其实也算客观描述，因为对一个考古工作者而言，古墓葬确实是日常工作中最常遇见的文物类型。

我决定整理演讲稿，丰富其细节，完善其表述。生活段子之类，或有媚俗之嫌，一律删去。演讲中偶尔夹杂的闲笔，以见我对生活、社会一贯的温和嘲讽，绝非刻意“媚雅”，则仍其旧，以酌情保留说话时的机锋与口语痕迹。

一 地下墓室

南宋墓葬的地下墓室，有三种类型：土坑墓，砖室墓，砖（石）椁石项墓。

土坑墓，从地面竖直向下挖出的长方形墓坑。这种形式，古今通行。在浙江，距今六七千年前的马家浜文化即已出现。

砖室墓，土坑里面包砌砖室，其上设置半圆形拱顶，即砖室券顶墓。在浙江，滥觞于新莽时期，东汉中期后逐渐盛行，为历代承袭。

砖（石）椁石项墓，先在土坑里面包砌砖室或以条石砌筑石室，其

上覆盖以横贯的石板，呈长方体“盒子”状。这种墓室，约于北宋中期前后在江南出现，至南宋，蔚为主流，成为最具代表性的形式。大理学家朱熹为长子朱塾治丧，即采用此种墓室，“其圹用石，上盖厚一尺许，五六段横凑之，两旁及底五寸许。内外皆用石灰、杂炭末、细沙、黄泥筑之”（《朱子语类》卷八十九）。

石椁石顶墓，不求体量大小，但求“盒子”能容棺即可。《朱子语类》载朱熹与弟子问答，以为“墓圹仅可容椁”可免盗掘之灾。但是，石顶墓讲究深埋、坚固、密闭与防腐。

江南“水浅土薄”，地下水位高，深埋与防水是一对矛盾。朱熹在福建泉州、漳州所见墓多浅葬，但时人并不普遍认同，以为“盖凡发掘者，皆以浅葬之故”，若遇洪水泛滥或土地耕作，浅葬更易遭到陵谷变迁。既要深埋，又要防水，墓室必求密闭。

如何密闭？墓室不大，置入棺木后，室内空隙有限。在空隙中注入“三合土”，黏土、石灰、沙子，拌以松香、糯米汁等，把墓室整体浇灌于地下。朱熹称之为“灰隔”，《朱子家礼·葬礼》“作灰隔”条：“穿圹既毕，先布炭末与圹底筑实，……石灰得沙而实，得土则粘，岁久结为全石，蝼蚁盗贼皆不能进也。”朱熹是孔子以来中国最伟大的圣人，讨论南宋社会礼俗，以他做例子，有其典型性。

密闭既为防水，更为防腐。三合土即古代的“水泥”，一旦板结，墓室与外界完全隔绝，若未经盗扰，墓内的一切将完好保存。江南宋元明墓葬，时常可见完好如新的棺木、随葬品，甚至木乃伊，全拜“灰隔”技术所赐。武义南宋徐谓礼墓、黄岩赵伯沄墓，均为其例。

防腐与保存死者尸骨的想法，与“孝亲”观念有关，将祖先遗体（坟墓）赋予同祠堂一样的功能，成为维系家族延续的象征，也与“魂魄”观念有关——魂是精神，魄是肉体。

密闭的墓室，确保逝者“魂”得安宁、“魄”获不朽，方能庇佑子

孙。“灵魂不灭”是丧葬的核心观念，墓葬形制、结构之种种，多与此相关。因为先人灵魂可以干预人间的生活，坟墓不只为死者而设，更为生者的福利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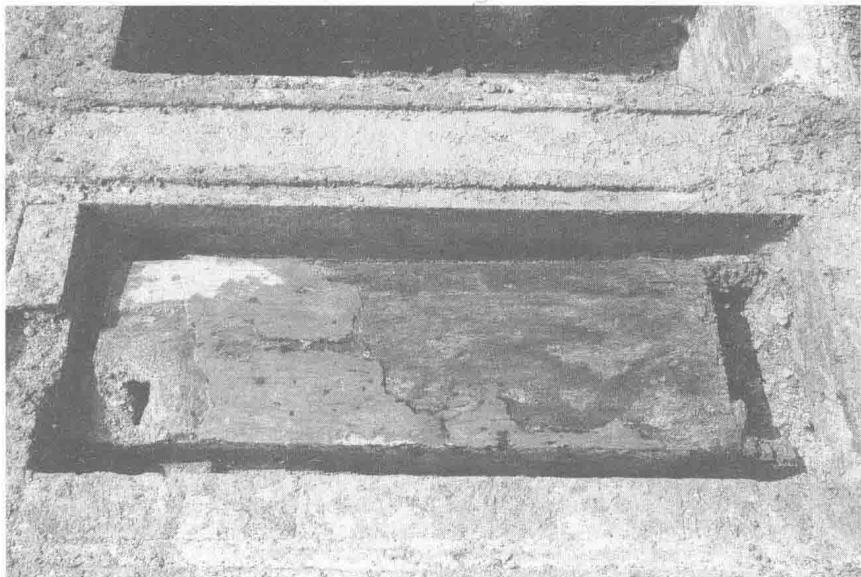
二 随葬品

如果只能用一个关键词形容南宋墓葬特征，那就是“世俗化”。世俗化，首先表现在随葬品上。

随葬品多为墓主人生前的服用玩好，通常直接反映他的趣味与价值观。江西星子县陶桂一墓，墓主人生前从学于“朱文公（熹）门人弘斋李文定公燔”之门，淳祐七年（1247）中进士，曾任庐山白鹿洞书院山长。棺内尸骨为衣物层层包裹，还随葬有北宋邵雍《邵尧夫先生诗全集》《击壤集》两种书，显然是其生前喜爱的读物，除此别无长物。据墓志称，陶桂一安贫乐道，“其生也衣董京之衣，其死也卧黔娄之衾，其殓也随平生服用，外覆以深衣而已”，俨然醇儒气象。

赵伯沄墓，墓主上身、下身各有八重衣物，尸骨与棺木之间，塞满衣物，以防止尸体在棺内晃动，除此还有随身的玉璧挂件和一面铜镜。赵伯沄系宋太祖七世孙，嘉定九年（1216）卒赠通议大夫，亦仅以随身衣物、玩好随葬。

徐谓礼墓，2005年被盗，出土告身、敕黄、印纸等文书17长卷，为国内首次出土的系统的南宋文书，轰动宋史学界。徐谓礼卒于淳祐六年（1246），官至朝散大夫、提举福建市舶兼知泉州。据盗墓者供称，除文书外，还出土毛笔、砚台、水晶镇纸、镇尺、印章等物。徐谓礼出身名门，因父荫入仕，乃父徐邦宪系南宋名臣。文房用品、印章等物，正是其日常生活的写照，也是文人“合理”的生活方式，而以文书随



• 武义南宋徐谓礼墓内棺木刚出土时情景，其墓室采用砖椁石顶的形式。



• 徐谓礼墓出土的《告身》文书（局部），是徐谓礼生前历任官阶的“委任状”汇抄，作为其官员身份的凭证。

葬，著其毕生仕宦履历，更是文官典型的生活趣味。

浙南丽水山区、江西等地宋墓，多随葬龙虎瓶、陶俑等明器神煞，牛鬼蛇神，大有巫风，在“外行人”看来，文物既美且多。而杭州、宁

绍地区的文人品官，反而不随葬明器，倘若保存欠佳，墓内衣物、书本朽尽，人们还以为是穷人家的“空墓”呢。其实，这正是杭宁绍地区文化发达、人们遵循儒家礼俗、对死亡抱持更加理性态度的结果。《朱子家礼》明确反对随葬明器，认为无用之物，“虽不用可也”。

世俗化的另一个表现，是墓葬等级制度的模糊。

考古学家研究古墓葬，有两大传统课题，一是分期编年，一是等级制度。中原商周大墓，甲型墓、乙型墓，四墓道、双墓道墓室的规格大小，随葬品多寡丰俭，九鼎八簋或七鼎六簋，均有明确的身份标识意义；汉代天子、王、侯陵墓的规格与随葬品，同样等级森严；学者研究唐代县令墓葬，也能找出若干规律性、制度性的内容。

至于南宋，等级差异就完全模糊了。

如龙游县余端礼墓（余端礼，宋宁宗朝官至左丞相，是当时一人之下，万人之上的人物），墓室为砖椁石顶，壁面无装饰，尺寸亦无过人之处，不过两米来长、一米来宽的盒子。又如金华县王淮墓（王淮是孝宗朝左丞相），砖椁石顶墓室，亦仅能周身而已。而民间的豪强，假如财力雄厚、子孝孙贤，也许都可以把墓室营造得更大，而显贵如王淮、余端礼者，反而只是仅可周身的小盒子。

人不分贵贱贫富，百年以后，确实享用不了多大的面积。至于现代人的骨灰盒，恐怕就更小了，盒子越小，体现社会文明程度越高。对不对？

三 地表墓园

墓室与随葬品，只是墓葬地下的一部分。从这部分看，等级制度确实模糊。事实上，一座完整的南宋墓葬，地表更有墓园建筑、墓仪



- 云和正屏山墓园，是较为典型、保存较好南宋墓园形式。

石刻等等。

由于年代久远，地表建筑荡然，而考古发掘又多出于临时，过去的发掘者多以掘取墓坑为务，而弃墓园遗迹于不顾，致使大量文物信息遗漏。其实，地下墓室只是一小部分，更多的学问还在地表。墓室是给死人用的，而墓园气派的观瞻是给活人看的。活人比死人重要。

南宋墓园的基本模式，呈“以中轴线分布、多级台地逐级抬升、主要建筑设施位于中轴线上、墓室居于中轴线末端”的平面格局。例如云